



当代以色列名家名作选

[以色列] 露丝·阿尔莫格 著

雨中之死

梦 是 黑 色 的
爱 是 是 红 色 的
雨 是 是 蓝 色 的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当代以色列名家名作选

雨中之死

[以色列] 露丝·阿尔莫格 著
朱美慧 译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30 号

图字: 01-98-1270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雨中之死/ (以色列) 阿尔莫格 (Almog, R.) 著; 朱美慧译. - 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1998.8

(当代以色列名家名作选)

书名原文: Death in the Rain

ISBN 7-5004-2338-1

I. 雨… II. ①阿… ②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以色列-现代 ②言情小说-以色列-现代 IV. I38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22456 号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)

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: 7.5

字数: 159 千字 印数: 1-2000 册

定价: 12.00 元

作 品 简 介

《雨中之死》是一部关于爱与死的小说。它由日记、信件和回忆等部分组成，描写了三个男人与两个女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，塑造了五个性格鲜明的人物：一位雄心勃勃但以自我为中心的学者，即这部小说的叙述者——利奇特教授；一位才华横溢但略带神经质的年轻科学家——亚历山大；一位从希腊流放到以色列的，具有天赋但注定遭受厄运的诗人——耶尼斯；一位感情细腻、极其敏感的环境建筑师——伊丽雪弗；另有一位在养育院长大的匈牙利难民，漂亮迷人的亨莉埃塔。

这是一部充满激情的细腻、敏感的作品。它对人类的生命、爱情、痛苦与死亡赋予了新的诠释与意义。片断式的描写，时间上的跳跃，存在的感觉，幻觉与回忆的交叉，构成了本书的特色，使其极富个人抒情色彩。地中海沿岸咖啡馆生活以及以色列、希腊的沙漠、山脉和海景的背景描写，使小说更加迷人生动，富有魅力。另外，作者对以色列、希腊历史文化的深厚知识也增强了这部小说非同寻常的魅力。该书在以色列出版后获得好评。

作者简介

《雨中之死》原作者露丝·阿尔莫格 1936 年生于以色列佩塔蒂克瓦(Petah Tikva)一德裔东正教家庭。她从事文学和哲学研究,写过小说、短篇故事及儿童故事等。1967 年以来成为以色列最重要的报纸——《哈阿雷兹》(Ha'aretz)文学版的固定撰稿人。曾两次获以色列儿童文学奖。其作品《光之源》于 1989 年获著名的布兰纳奖。其他主要作品有:《放逐》(1970),《陌生人与敌人》(1980),《银球》(1986),《神奇鸟》(1991),《完美的情人》(1995)等。阿尔莫格的作品文风优雅,语言优美抒情,人物刻画鲜明突出,笔触细腻生动,具有很强的感染力。

当代以色列名家名作选

雨中之死

Death in the Rain

by Ruth Almog

Copyright © by Ruth Almog.

Chinese Translation © by the Institute for the Translation
of Hebrew Literature, Ramat Gan, Israel.

本书由以色列希伯来文学翻译所授权出版

第一部 播种的人有福了

那些只播种而不收获的人有福了
因为他们将流浪远方……

——阿弗拉哈姆·本·伊兹哈克

利奇特

有人在摁门铃。他不肯走开，不停地摁门铃并大声叫着：“利奇特教授，请开门，开门！”

我不知该怎么办，我想我一定是慌了。我费劲地走到门边，问谁在外面。我的声音听起来相当奇怪。好长时间没听过自己的声音了，现在听起来仿佛出自别人之口。门外的声音却很熟悉，我稍稍放心来，但还是犹豫了一会儿，似乎要做的事极其困难且生死攸关。门外的人催促着，恳求着。很显然，我知道我挡不住他的请求。我会去开门的，尽管我迟疑了一两秒钟，想拖延自己的决定。但最终我还

是会去的，因为是自己想开门，而不是有人拧着我的胳膊强迫我开。毕竟门外的人并不打算强行闯入。

门外站着这个街区的邮差。我认识他已有多年。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从孩提时代就与他认识了，似乎和他一起长大，一起目睹了一幢幢丑陋的建筑在这曾经安宁静谧的街上冒出、增多，渐渐取代了原来的小房子。

我记得诺那时已是一个大女孩（我们搬到这儿住的时候她多大了？十岁还是十一岁？）那时，我们常在街上遇见这邮差。他总是停下来，和诺说说话，或者拉长脸逗她乐，好像诺还是个小娃娃似的。他的兜里总是装着专为孩子们准备的酸糖。孩子们老在他身后追着要糖，要了一颗又一颗。真滑稽，这让我想起小时候我们怎么跟在冰车后面跑着，抢卖冰人用勺子刮下冰片时飞出的小冰渣，想起我们又吮又嘬的情节……

“对不起，利奇特教授，打扰您了，”邮差说道，“但事情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请理解我的意思，你的邮箱早塞得满满的，没空地了，你该打开它瞧瞧。也许会有些你想看的东、西、重要的东西。”

我身材高大，邮差却又矮又胖，说话的样子带着巴结的意味。他的友善是装出来的，我想他生来不是这个样子。谦卑的个性是后天养成的而不是与生俱来的。他一定是在战争中学会的这一点。想想他能在战争中幸免于难就能明白他的个性。尽管他殷勤和蔼，但极可能是个危险人物。任何一个能从战争中逃生的人都知道怎么打仗。我不信任这些活下来的人。但与此同时我也注意到他怕惹恼了我，也许他害怕某种情感会爆发。另一方面，我心想，正是由于他过去的经历

才使他现在比其他任何人更有可能来敲我深锁的门，仿佛现在他与我之间存在着某种共同的东西。

我待他总是很温和，我不想每天去邮局。但现在，天晓得，我居然把自己与这个我不喜欢的人联系起来，似乎我们之间有了某些共同点。但是即使我这么想，我知道我猜都猜不到他到底有过什么经历。

我没回答他的当儿，他已恢复了常态，似乎是从我的软弱中汲取了力量。他用一种坚定的，甚至是命令的口气叫我去拿邮箱的钥匙。

我照他说的做了。很奇怪我竟然很乐意服从他，仿佛我一直期待着有人来告诉我该做些什么，这样我就有理由做一些也许我不该做的事。也许他也一样，用自己的无奈和无助做借口，做他本不该做的事。

我知道怀疑他的为人是很卑鄙的。我知道我没有权利品评他。这只是我私下的猜疑，是我对自己道德的怀疑。这种猜疑使我总是对别人吹毛求疵。利奇特教授，你是狗屎，我对自己说道，十足的狗屎！多年来我再也没用自己的名字来称呼自己了。想到这儿我不禁暗笑，以前叫阿维格多的我似乎已经死了。你是个伪君子，我对自己说，你总是装出一副与学生亲密无间的样子，但一旦有人不称呼你为教授，你就怀恨在心，你立刻会想办法让他循规蹈矩，而且你對自己所用的手段一点也不觉得恶心。

我跟着邮差下楼。突然他停住脚步，转过身来，友好地把一只手搁在我的胳膊上。我急忙闪开，躲避他的接触。他说：“听着，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明白吗？这是不可能的。”他试图朝我笑，但只是扯了扯嘴角，做了个笑的模样，眼睛

却依然严厉而冷酷。“我理解你这种处境，我曾经经历过，而且是比这更糟糕的境况。当然，你不可能忘记，但你必须活下去。”我什么都没说。他耸耸肩，转身走下楼梯。我心想：谁说必须活下去？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你知道该怎么办。就像我的女儿诺，她从不认为活着有什么好“必须”的……

我公寓里的窗帘都拉着。所以当我踏入门厅，强烈的光线陡然迎面射来，令我头晕目眩。门厅的墙上挂着我的邮箱。邮箱是绿色的，和其他邮箱相比，它个头大，里面的邮件塞得似乎要爆开似的。我的邮件很多，大部分是与工作有关的信件。我的朋友少得惊人。不，也没什么好惊人的。我从不同国家订阅了各种杂志，参加了各种委员会和组织机构。全世界都有我的同事和熟人，他们时不时会给我来信。这就是我为什么需要一个特别大的邮箱的原因。我打开邮箱，信件落入手中，有些掉到地板上。一张张褐色的信封，大大小小的杂志、请柬，来自世界各地学术同行们的信，也许其中有我那飘泊远游的哥哥的信，还有一些明信片 and 付款单。邮差拾起一些信递给我，然后跟我道再见。走之前他庄重地握了握我的手，说：“记住我的话，这是我的经验之谈：你必须活下去。这才是解决办法。”他又补充道：“祝你好运，一切和从前一样，就当什么也不曾发生。”

就像许多孤独的人要通过外部事件与别人联系一样，邮件对我来说是获得安宁的一种源泉。分拣信、拆信是我的一种快乐，即使在工作，我也不让秘书处理我的邮件，而把那份快乐留给我自己。

我走回公寓，把那一堆邮件放在餐桌上。桌子的黄色福米加塑料贴面干干净净。我老想换桌子，我讨厌黄色。黄

色是疯狂的颜色，所有凡·高的癫狂都来自黄色。但我的妻子莉却喜欢这张桌子，这是我们刚搬进这所公寓时买的。对她来说，它是舒适的标志，而我们已好几年没有这种舒适的感觉了。战后，她说：“为什么你不呆在军队里？这样我们可以省点钱安顿下来。”但我不听。“你在耶路撒冷找份工作，”我说：“我回学校读书。”所以有好几年我们一直靠她微薄的薪水度日。

我们在密希肯若思一以色列租了间房子，由房东太太照看诺。在那种情况下带一个小孩生活也不容易。莉讨厌她那份工作，她很想全身心地照顾孩子，但工作却使她不能这么做，这令她很痛苦。那时候，生活没什么好说的，除了我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功之外，我想就只有那春天里在街区边缘的空地上长得又高又漂亮的蜀葵了。后来我去了牛津大学，又去了哈佛大学。莉一直不快乐。不，她在哪儿都不快乐。漂泊不定的感觉使她害怕。只有在这儿，在这所公寓里，在最终说服我回到以色列并安顿下来的这所房子里，她才感到快乐。虽然她有点迷信，但对她来说，是福米加，是福米加制成的所有东西，象征着富足，而不是松木或红木。这没什么好奇怪的。在她的家乡她见过大量的木材。她的童年、青年都在沉重的、古老的家具间度过。福米加代表着时尚、时髦和新颖。也许她想抛弃和否认木头以使自己显得不那么守旧。是的，我的妻子希望做一个现代女性。

桌子干干净净的。我吃得很少。东西都保存得相当干净。这一段时间我没吃过一片面包，但房子里所有的甜面包干和其他烘烤食物已被我全部扫光。莉用来放小甜饼和糖果的彩色罐子空了，装果酱和蜂蜜的坛子也空了，只剩下几听

沙丁鱼。

街上，警报声呼啸而过。是一辆救火车或救护车，也许是警车。我受不了警报声。每次听到这种声音我的心跳便会停止几秒钟。我感到一种恐惧，这让我感到羞愧。年轻时我什么都不怕。那时我们也不会为了死人而感到太多的悲哀。我们的态度不一样。当然人们也很悲痛，但有些不同：我们总是远离这种微妙的、啮人的悲哀。但近年来，也许是老了，也许因为我不再参加战斗了，我变得和其他人一样紧张不安。或许是因为这恶梦已做得太长，是一种累积而成的效应。或许这种情绪是从诺参军以后开始的。几乎每天都有人死去。承包商在发战争财，而年轻人则走向死亡。

我讨厌沙丁鱼，总是把它留到最后吃。由于没有面包、面包屑，所以连蚂蚁也没有。我发现屋里有蟑螂。一到晚上，大大小小的蟑螂满屋乱窜，虽不伤人，却令人恶心。有时我想办法杀死几只，试图用我的英雄行为来战胜我的嫌恶情绪，但没什么用。对此我毫无办法，我一定要喷洒杀虫剂，尽管我受不了杀虫剂的气味。我在家的时候，莉从不用杀虫剂。但有时我回到家里，发现屋里充满了那种令人窒息的讨厌的气味，我便大为恼怒。莉不知如何才能平息我的怒火。她有洁癖，滴滴涕是她的同盟军。

我必须叫人来用烟熏熏这房子。我还得出去买点东西。我女儿诺所采购的食品已全部吃完。也许我试图把自己饿死，就像果戈理^①在他精神不正常时那样？但我并没有发

^① 果戈理（1809—1852），俄国作家，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。

疯，我也不是一个天才，虽然我曾喜欢这么想，并以此作为我诱惑他人的策略：真正的我只是一个又老又多嘴的人，一个乏味的书虫罢了。我不愿意死，我还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死这个问题。我不会诅咒自己去死，甚至不可能这样做，甚至现在我的脑子还会想起年轻女孩们……一个老色鬼，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人。不，还没老，只是上了点年纪。一个上了点年纪的色鬼决定坐下来写一本书以赎罪……

没有任何帐单，水、电或电话帐单。显然，市政府也把我遗忘了。或者是诺已预先支付了一年的这些费用。还有一些银行结单，一些展览会的邀请，展览会也许，噢，不，肯定已经结束了。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。有个国际会议的邀请，还有个去罗马作系列讲座的邀请。啊，在罗马遇见一个漂亮女孩，那女孩在罗马街头拎着重重的皮箱，我上前帮忙，接着是不温不火的调情，不太认真，没有承诺……难道我还能有这种想法？还有一封我哥哥从澳大利亚寄来的信，写着“那些只播种而不收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将流浪远方”。我哥哥在失去了两个儿子后离开了这个国家。他在这儿呆不下去了。我理解他。我总是能理解他。还有一些科学出版物，几份期刊，一封来自希腊的信，以及一张邮局发来的包裹领取通知单。包裹也是从希腊寄来的。

莉死时，许多人来表达他们的同情。我们坐着——我和女儿诺——一整天坐在起居室临时搭成的板凳上。人来了又走，走了又来。他们和我们说话，我们也回答他们。有时我们甚至微笑。我的熟人们、同事、亲戚，甚至那些突然想起我们存在的远亲们、邻居以及诺的朋友们都来了。甚至那个邮差也来了。他对我们说，愿主安慰你们。他坐了几分钟，

后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酸糖，递给诺，好像诺还是个小女孩似的。他没有给我糖。大人不需要糖果。晚上我们锁了门。诺和我各自拉下自己房间的窗帘睡觉了。

诺做饭，她的一个朋友负责购物。几乎每天都有人从超市送一箱食品来，有罐头、果汁、食油、鸡蛋、甜饼、巧克力等，仿佛战争就要爆发似的（我感到很奇怪，但我从未问诺她为什么这么干）。每天诺为家具和照片掸灰，用一支羽毛掸子掸书。每天早晨她都要冲个澡。她的气味像是入侵者侵占了房子的每间屋子。每次我出国都给她带回一瓶香水，最好的、最昂贵的那种。她像孩子一样收集香水瓶，放在床上方的架子上陈列。夏天她喜欢韦尔那种轻淡的、略带刺鼻的味道，秋天她更喜欢用迪奥香水，冬春她则用那种浓烈的贵兰香水。

我注意到每天垃圾桶里都塞满了她的旧练习本和撕碎的内页。她还扔出她的宝贝东西，那些她从孩提时代起一直拒绝与它们分开的东西，甚至包括那个我从英格兰给她带回来的黄色玩具熊。她以前总是带着它上床睡觉。诺，这个原本与她的所有物难分难舍的孩子正扔掉她所有的宝贝。每年在逾越节春天清扫前，家里总要爆发一场激烈的争议。莉坚持让诺扔掉她的垃圾，而诺则不干。一天我对诺说，你妈妈在的时候，你留着所有废物让她生气，现在你却不要它们了。我多傻、多愚蠢啊。在我妻子死后的第七天，我重新开始了工作。后来我们立起一块墓碑，一切似乎又步入正轨。莉离开我们几个月后的一个早晨，我发现诺死在她的床上。我的女儿，诺。

伊丽雪弗

“所有孤独的人啊，他们来自何处，他们属于何方……”一支温柔的歌，扣人心弦，让忧伤在心底融化。我喜欢这首歌以及甲壳虫乐队演唱的其他歌曲。但怎么可以在这封闭的公共汽车内，以最大音量播放这歌曲？人们都怎么了？都聋了吗？他们怎能忍受这噪音？

要是向司机抱怨，得到的只会是粗鲁的回答，在众人面前遭谩骂和海辱。天啊，这些司机真让人受不了！我一直记得有一次我上车时司机关门卡住我的胳膊的情景。当时没人排队，汽车上也不拥挤，我是在车站等车的惟一一名乘客。但司机把车停在路中间，离站还好远。我只好跑过去，那司机一定很着急，说不定在线路的终点有个女孩正等着他。

喧嚣吵闹的音乐令我震惊。那是一曲哀婉的《莱诺·里格比》——一首本该轻轻柔柔播放的歌。我受到震撼，忘记了旅程中一直在脑海浮现的那些模模糊糊的、让我心痛的画面。它们如同闪电在远处掠过，我一个一个甩掉它们，但它们又顽固地反扑回来。音乐抑制了我虽极力忍住却仍涌出的泪水。特拉维夫到了。一幢幢大楼的入口处布满了一个个黑洞，仿佛一张张魔鬼的大口要吞噬我，破碎的窗户衬着灰黑的墙壁，像是一种大毁灭之后留下的纪念。楼的门腐烂了，阳台上的灰泥掉下，露出里面生锈的管道：犹如光天化日下的脱衣舞女郎。由熟铁制成的阳台栏杆，原是一种流行的装饰形式。但这些过去美丽的痕迹，现在已扭曲变形，锈迹斑斑，快与其底座分家了。

正午的太阳散发着热气，那强烈的光线使丑陋的景象格外突出，司机的收音机里飘出的歌声似乎在敲击着我的太阳穴：“莱诺·里格比在窗边等候，却没有一个人走近。”

我从包里取出一片阿司匹林，没就水就吞了下去。我多想就在那儿下车，在小摊上找点饮料喝。但我离家已远，我的脚因疲惫而肿胀。

为什么我的同胞们对别人总是麻木不仁、毫不体谅？是气候造成的原因，还是土耳其苏丹秘密传下的遗产？我不敢认为这是由于犹太人在外散居形成的结果，现在这种想法有亵渎之嫌。

为什么我去了那儿？想满足什么需求？为什么他装出一副不认识我的样子？或者他真的没认出我来？也许他的视力更糟糕了。他也变老了，或者是因为我变了……

在特拉维夫郊区，这些影像消失了，这些恼人的问题也安定下来。我不想回答它们。像往常一样，我躲入四周的景色中，躲入现在，让自己不再想过去，不再想将来。

耶尼斯曾提醒我，他说：“你选择成为一个环境建筑师并不是偶然的。建造房屋的建筑师不仅要考虑外部事物，还得考虑人们的需求。但你——你是为了逃入外面的世界，你说你喜欢成为一个观察者。当然，我相信这一点，但你的解释是错的，你只是在逃避你自己。”

我该怎么向他解释？向他解释说这是因为那些拒绝愈合的伤口迫使我逃入外面的世界？

切勒诺夫街堵车了。有一辆摩托车在一行行车间艰难地穿行，一点点向前挪，车喇叭无助地响着。只有街上空无一人时，车才可能全速前进。

司机往后一靠，耐心等候。每天这儿总堵车，几乎每天的这个点。他已习惯了，但我却焦躁起来。停在我们前面的小汽车突然向前一冲又刹住了。这车的司机却漠然地等待着，音乐依然在轰鸣。每天淹没在引擎的噪音和尖锐刺耳的刹车声中会是什么感觉？我想，生活总是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碾人，把人碾成尘土。

不，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去那儿，到底为了什么。昨天，在街上，蓦地，P先生与我擦肩而过。他甚至没和我打招呼，他没认出我。或者他假装没认出我？我想追上他，和他说话。我的心在颤栗。但我依然走我的路，记忆在头脑中回旋。为什么我不停下来，为什么我不跟着他？也许他会轻抚我的头发，说：“你的头发真硬，你还在用同样的香波。你还和以前一样风情万种。”他以前就这样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在这种出乎意料的邂逅中，如果他这么跟我说，我便能记起他粗糙、坚硬的手。它曾触摸过我的头发，使我的身体充满了一种无法表达的安宁。

但我没有跟着他。回家的路上，我的脑子里全是一些沉重的、燃烧的，甚至屈辱的念头。到家后我打开这本日记，开始翻读。好几年了，它不是在这个抽屉就是在其他地方落尘。以前，无论去哪儿我都带着它，但极少看它，偶尔在上面写点东西。有时我会在路边的凳子上坐下来写日记，有时在咖啡馆，甚至在公共汽车上。每页的字迹均不一样，但随处都弥漫着一种凄凉，令我厌倦。我重新看时，总是看最后而不看开头。我感到羞愧，我写这些时，还是那么年轻。我记不得为什么……所有这些对那个被我称为皮埃尔的男人的